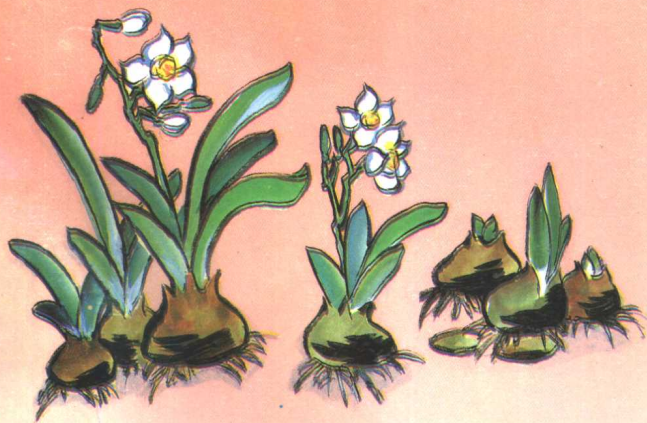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

李双 张忆 主编

伤 痕

谷声应 陈利民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短篇小说

伤

痕

李双 张斌 主编
谷声应 陈利民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伤 痕

谷声应 陈利民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山区复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31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149-5/1·138

定价:9.10 元

总序——

中国新文学的再度辉煌

谢冕

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光芒，所有心理正常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因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创造而感到骄傲。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久远的歧误之后重现文学的辉煌，这当然是由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给予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家汗水掺和血泪的浇灌而成。挤压下的坚持、逆境中的抗争、死劫里潜涌着再生的信念。在一个惊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勃发而为创造的激情。

本世纪七十年代的终结大抵宣告了文学桎梏的终结。从那时开始算起，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一般被认为一个文学阶段的结束）刚好十年，要是推衍到现在，也不过十数年。可以欣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与“五四”新文学那十年所做的至少并不逊色。偏离的纠正，断裂的弥合，传统的接续，特别重要的是，以崭新的姿态和风貌记录了一个悲剧时代所给予当代中国人精神经历的心灵刻痕。

中国新文学这一个崭新的阶段，依然以充分意识到时代使命的浪漫情怀为导引，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以义无反顾的进取姿态，向着世界现代艺术潮流汲取养料。不长的时间内，我们高效率

地弥补了与世隔绝状态下文学的缺失与匮乏。这情景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短短的十年中间，西欧两个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这里有仿效，有借鉴，更有吸收与展延。

参照和互补很快地改善了中国文学的营养不良状态，自由创造的禁忌消除之后，文学有效地调整了与世界的差距。大一统的格局结束了，代之以多元共生的繁复驳杂的秩序。各色各样的作家，各色各样的流派和风格，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奇观。

中国文学似乎怀有某种紧迫感，仿佛要趁着本世纪太阳尚未落山的时节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文学的确有感于谬误诱导的异变所造成的损失，它以先于社会的自我完善作出补偿。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中国文学消除了长期的蒙羞。当然，较之“五四”最初十年的鼎盛气象，我们以未曾拥有一批文学巨星而遗憾。但诗人说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这是一个争取人性和恢复人性的时代。从文学中走来了平常的人，他们身上有着泥桨和血污，他们是真的人，拒绝了神的光环，也挣脱了鬼的诱惑。

尽管依然有着某种世俗的金钱和权力施加的暗影，尽管依然有着摆脱思想枷锁之后的无节制、随意性、游戏态度，以及肤浅、浮躁、乃至远离高雅的鄙俗化，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座智慧、勤苦和才华垒积的精神圣殿。这是中国新文学的二度辉煌。

有了丰富多采的文学，便有与之相适应的淘汰，这种淘汰显示文学竞争的严酷性。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文学史的记录，再就是选家的择取，乃是实现这一严酷性的常规方式。这一时期文学选本的编辑出版相当丰富，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文学发展的实绩。选家的工作同样是神圣的，选家严峻的慧识会生发出文学接受和消费的积极影响。若是说，创作是生产，批评是鉴定，那么，选本则是集结和留存。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日于畅春园

总 前 言

幸蒙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们编选这套纯文学丛书。年余时间来，我们虽然紧张努力地工作，仍时时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们祈祷不要因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偏颇，给本丛书带来太多的缺憾。当然，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激励着我们鼓起勇气。这冲动和愿望源于我们心灵深处对美丽人性的渴盼和呼唤——在经历了“文革”空前绝后的荒唐和可怕的沉寂之后，仿佛春雷辽远而深沉的回声，新时期文学人性复苏与解放的福音，是多么温暖地抚慰着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

而今回眸，如果以《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十余载光阴倏忽已逝。现代以来，中国文坛除了“五四”新文学近二十年时间，还没有哪一个年代能与新时期的生机与繁荣媲美。有趣的是，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发展轨迹上有惊人的一致。1918年周氏兄弟，一位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提出“人的文学”，一位以创作呐喊“救救孩子”，代表了新文学肇始以人的解放和人本主义的力倡为主潮的特色。随后，新文学从两大方面发展。高张人的大旗，抨击封建思想的启蒙文学，继续肩起社会历史的重任艰难前行，并由此而诞生了许多不朽名著，如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曹禺先生的《雷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茅盾先生的《蚀》等等。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它的认识、教育作用之外的审美作用，也得到许多作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文学艺术的本体建设出发，西方各种文艺流派、思潮，被新文学建设者们热

忱而匆忙地加以介绍、效法，并形成与以启蒙为宗旨的“为人生”文学相对应的“为艺术”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向二十世纪的中国奉献出《围城》、《边城》以及象征派、现代派、新月派诗等杰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镌刻下令人难忘的一笔。其实，中国新文学创作的两大倾向，不论“为人生”抑或“为艺术”，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选择的方式和道路不一样，才生出许多论争和矛盾。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看到，“为人生”的启蒙文学重在为人生，而“为艺术”的文学重在艺术地为人生；人生，是其不可或缺的根本。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容易蜕变为概念化的宣传品；艺术地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成为文字游戏，徒有“艺术”而没有人生。

那么，对照新时期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相通。在七十年代末坚冰渐融，阴霾始散的中国，“伤痕文学”以它独特的魅力和丰采崛起于文坛，诗人们逆着受愚弄的血泪宣告“我不相信”；激烈的反叛，锥心的梦醒，求索的迷惘和彷徨，都是为了追寻那消逝已久的人的感情和人的尊严。固然，新时期文学旗帜上“人”的大字，在初期并没有六十年前那么醒目，那么意气蓬勃。但它是坚韧的，我们感觉到少了外在的躁动，而更多不可阻遏的力度；它的土壤已不象六十年前那么纤细和单薄，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丰沃。它甚至没有虚饰和标榜，不屈地以自己的实绩冲破茧缚，生行壮大。

当然，正如新文学初期那样，突如其来的解放是如此地令人激动，作家们在仓促之中，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鼓舞下，热忱满怀地掀起了第一个创作高潮。可以说，这一个高潮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着文学观念上的先天的不足，存在着艺术形式上的粗糙和表现方式的模式化等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在八十年代初便开始得到有意识的克服。随后，朦胧诗的价值获得了公认，“寻根派”小说，林林总总的诗歌流派，不依循三一律的戏剧，以及各种作品所表现出的自由形式和奇特内蕴，共同形成了文学创作五彩缤纷的局面。如果用惯常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八

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坛在现实主义文学革新深化的同时,各种其他文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得到了作家们的充分重视和吸收。七十年代末诗歌创作发出的追求艺术形式美的微弱信号,此时终于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尽管新时期文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也没有“为人生”、“为艺术”的明确口号,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作品本身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它是以“为人生”开始而向“为艺术”过渡的。所谓“为人生”,就是偏重于、寄厚望于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这与新文学中“社会问题小说”相似。这样的文学,是它的存在置于社会的和类的需要之下的。历史证明,在特定条件下社会对“为人生”文学的需求,必然随着条件的消失而转向“为艺术”的文学。而在向“为艺术”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个体的自由凸现出来,有时候出现本末倒置的纯形式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不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都无法摒弃人,摒弃人本精神。“为人生”首先应该是“艺术地”,才具有文学的特质;“为艺术”必须从人出发,才不会异化艺术的目的。

有人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人本主义的,九十年代的文学是拜金主义的。我们既不认为这是现实,也不希望这个论点成为现实。的确,今天是纯文学面临危机的时代。商品大潮似乎具有冲击一切的魔力。甚至于,有人以“玩文学”为时髦。我们认为,文学当然应该具有可“玩”性,因为审美首先是感性的;但文学不等同于胡编瞎侃,也不是滥情泄欲的工具。“玩文学”作品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它不“玩”的部分。另一方面,如果纯文学是诚挚而忧郁地关注着人生的,是美丽而动人地表现人生的,是艺术地为人生服务的,那么,它是否真的会发生危机呢?

从“五四”到现在,尽管经受了不堪回首的断代,障碍重重的阻隔,但可敬可佩的文学家们没有放弃做人的责任和权利。不可否认,“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先驱们开创的全新事业,在其后的数十年

中,也由继承者们顽强地发展着,并且在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等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新气象,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初一些感奋人民,反映现实的较好作品,都是新文学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只是在“文革”十年中,受极左毒害,新文学的生机才被彻底扼杀。而一旦迎来结束“文革”的春天,它便迅速地新生了。我们遴选出的这些佳作,就是新文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断言,正如现在人们离不开商品一样,人们也绝不会将一切都看成商品。迎着新世纪曙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饱经沧桑的文学,是植根于民族苦痛中血与泪的文学,也是为自由意志而呼号抗争的文学,我们期望并坚信它必将发展成为真正美丽的人的文学!

李双 张忆

一九九三年夏于北京花园村2号

编选者前言

今天回顾七十年代末的文学创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本来，在五十年代就涌现出《小巷深处》等优秀作品的短篇小说创作，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摧残，应当早就呈现出姹紫嫣红、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了。历史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在认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岁月里，怎么可能落实“双百”方针，又怎么可能实现短篇小说创作的飞跃和升华呢？

作为开新时期文学风气之先的“伤痕文学”，它的价值和不足，现在应该说已有公论。我们对它当年带给人们灵魂的震颤和惊喜，对它勇敢的锐气和动人的生机记忆犹新；而且，我们也认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不能仅从“伤痕”这个字眼上去简单地理解。它的内蕴和意义，也许远不是“伤痕”所能概括得完全的。当然，毋庸讳言，在文学长期枯萎的前提下，这一时期的创作无法避免初始阶段的幼稚和粗糙；甚至从纯文学角度看，有的作品在今天已经被超越。我们之所以选录，主要是因为它们无法替代的历史位置，是因为我们不愿忘记过去，不愿让它们被时间湮没，不愿读者只看见新时期文学如日中天的现在，而忽略了它旭日初开的曙光。

本书收入的十多篇短篇小说，在当年都曾风靡文坛。《班主任》、《伤痕》以焕然一新的思想深度和价值取向，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重逢》则从历史的高度，对“文革”的后果和原因提出了大胆质疑，犀利地将到底审判谁的问题置于读者面前。《我是谁》、

《在小河那边》、《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对左祸的反思和鞭笞，而《思念你，桦林》和《爱是不能忘记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冲破了长久以来对爱的禁锢，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风筝飘带》、《灵与肉》、《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本次列车终点》、《头像》等篇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集中唯一一篇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的，是《大淖记事》，作者娴熟的技巧和简明朴实的风格，使小说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谷声应 陈利民

1993年初于北京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顾	问	冰	心	萧	乾	严文井	杨宪益
荣誉主编		谢	冕				
主	编	李	双	张	忆		
编	委	陈利民	勾承益	勾承益	谷声应(常务)		
		李丹	李海燕	李双			
		李亚东	刘忆芬	刘勇(常务)			
		阮航	荣挺进	王森			
		向万成	辛作良	徐建川			
		张忆	周星				
特邀编审		樊发稼					

目 录

总 序	谢 冕(1)
总前言	李 双 张 忆(1)
编选者前言	谷声应 陈利民(1)
飘逝的花头巾	陈建功(1)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23)
思念你,桦林!	龚巧明(34)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 华(50)
重 逢	金 河(73)
在小河那边	孔捷生(93)
头 像	林斤澜(114)
班主任	刘心武(127)
伤 痕	卢新华(150)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鹃(162)
大淖记事	汪曾祺(181)
本次列车终点	王安忆(199)
风筝飘带	王 蒙(223)
蓝蓝的木兰溪	叶蔚林(240)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260)
灵与肉	张贤亮(275)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299)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	张辛欣(316)
黑娃照像·····	张一弓(344)
枫·····	郑 义(356)
山月不知心里事·····	周克芹(371)
我是谁·····	宗 璞(386)

飘逝的花头巾

陈建功

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期六晚上，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他连理也没理，沉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

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

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得高且直，嘴唇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他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

“没有。”

“我看你很累的样子。”

“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

我们沉默了。

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

“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脱不开身。”

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谈谈。他说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灯以后，躺到床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

“为什么？”

又是沉默。

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

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总不能……”

“嘶啦——”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

“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

“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干嘛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水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秦江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

“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

“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给我再上一瓶汽水。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叮叮当当四处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了’……酒足饭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活的浪潮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什么。爸爸也越来越罗苏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骂我，说我是奥勃洛摩夫！我反过来也讽刺他：‘老布！’——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我说：‘老布，你起得早！读你那砖头厚的“马经”去吧，管蛋用！’把他气得直哆嗦……”